

社会学家

主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Teahouse For Sociologists 总第十五辑 2006.2

茶座

【李培林

社会公正、黄金分割与和谐社会

【潘天群

对思想的一个社会学考察——博弈论与社会

【唐 逸、何怀宏、刘少杰、赵 园

聚焦：化解社会戾气 构建和谐社会

【刘 耳

人少为患？——21世纪的人口问题

【薛 涌

男同性恋——希腊民主之父（下篇）

【潘乃谷

费孝通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上篇）

【张荣明

骷髅与哲人——兼说其在法术、艺术和结社中的功能（上篇）

【韦明铤

“杭铁头”——《浊世苍生》续写之二

【赵 峰

凡伯伦的诡谲微笑

说“戾气致异”

说“戾气致异”于怀的《板桥杂记》，记叙明季文人的流风余韵，其中有这样一则轶事：

莱阳姜如须，游于李十娘家，渔于色，匿不出户。方密之、孙克咸并能屏风上行，漏下三刻，星河皎然，连袂间行，经过赵李，垂帘闭户，夜人定矣。两君一跃登屋，直至卧房，排闥闾行，势如贼盗。如须下床，跪称：“大王乞命，毋伤十娘！”两君掷刀大笑曰：“三郎郎当！三郎郎当！”

有明一代，因其处在16世纪中西发展的大分叉时段，故而特别受到学界的关注。前年适逢夏历甲申，再祭甲申还成了网络讨论的热门题目。赵园教授几年前从事明清士大夫的研究，以女性研究者特有的细心与敏感，从明代文献中拈出了“戾气致异”一语，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与文化氛围形容写照，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从上引方以智等人的轶事可以见出，当时，连文人促狭，玩笑中也不免带有三分“戾气”。

何谓“戾气”？古来训释者有谓：“乖，戾也。”认为二字可以互训。有说：“戾，贪也。”还有的认为：“戾，暴也”；“戾，虐也”；“戾，恶气也”。清代乾嘉学派的巨擘段玉裁则总结道：“戾，了戾，乖戾，狠戾，皆其义也。”晚明之际，盖因各种社会政治矛盾交集，既有的政治社会体制难以容纳，遂导致社会冲突加剧；文人间蛮触交争，相互仇视。他们对于即将来临的全新时代，既缺乏敏锐的识见，也丧失了价值的共识。此“戾气”之所由生也。

王船山所说的“戾气”，指称的是政教习俗的乖戾。法国社会思想家托克维尔则将这一政教习俗称之为“民情与风习(moeurs et coutumes)”。在他看来，影响一个政治社会共同体的因素有三，一是自然环境与资源，二是典章制度包括政府机构组织与各种法令，三是民情风习。三者之中，尤以民情与风习最为重要。它指称的是一个社会所共同遵循的价值规范与一般心理习惯。作为社会状况的主要构成部分，它最终决定着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与结构。

从儒家的“致中和”到墨家的“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做贱，诈不欺愚”，华夏民族自古即有关于社会和谐的理想。同为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在总结明季戾气致异的教训时曾慨乎言之，百年寿之不足，一旦毁之有余。而王船山所关切的，则是如何透过“慈以生和，和以生文”来转变政教习俗，让“百年器陵噬搏”之戾气，“寢衰寢微，以消释于无形”。

若论甲申之祭，这一“戾气致异”的教训，或许更值得今人记取。

王 焱

2006年6月25日

目 录

主 编 张立升
执行主编 王 焱
助 理 王 萍
责任编辑 王海玲

卷首语 | FOREWORD

001 王 焱 说“戾气致异”

随 笔 | ESSAYS

004 潘天群 对思想的一个社会学考察——博弈论与社会

008 王开岭 “搞笑诺贝尔”与虚实之辨

012 陆 扬 哲学和文学的恩怨

016 戈 革 戏说“套诗”

022 黄国泰 威胁生命的无价值感

025 王学泰 旧体诗一束(之三)

聚 焦 | PERSPECTIVES

化解社会戾气 构建和谐社会

029 唐 逸 社会暴力的蔓延与消解

038 何怀宏 承平下的一种战争态度

044 刘少杰 语言暴力的感性化

048 赵 园 明季的集体施暴与个人复仇

社 会 | SOCIETY

051 李培林 社会公正、黄金分割与和谐社会

056 刘 耳 人少为患?——21世纪的人口问题

062 韦明铤 “杭铁头”——《浊世苍生》续写之二

067 张荣明 骷髅与哲人——兼说其在法术、艺术和结社中的功能(上篇)

- 073 刘达临 人类性的社会进化断想
076 吕 鹏 是“下层阶级”，还是“底层群体”？
079 吴万伟译 美国对未来浪漫的爱

社会思想 | SOCIAL THOUGHT

- 085 苏国勋 中东问题的宗教社会学解读——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共生之五
090 宫留记 布迪厄的学术轨迹与身份

学术圈 | ACADEMICAL CIRCLES

- 096 潘乃谷 费孝通先生的第三次学术生命(上篇)
103 薛 涌 男同性恋——希腊民主之父(下篇)
109 赵 峰 凡伯伦的诡谲微笑
116 高永平 女性客体化与两性生理差异——我看夏、王之争
122 叶永青 “始乱终弃：2006 中国当代的社会学图像”前言

阅 读 | READING

- 126 陈蓉霞 休闲离我们有多远？
130 邹建立 科层组织的恶性循环——读克罗齐埃《科层现象》札记
134 孔庆典 性史·禁书·睡觉字典——读《云雨》

世 相 | MASSES

- 138 赵铁林 黄明芳 学得屠龙术，货与帝王家——老北京话城南之八
145 方 刚 “牛郎”——男性性工作者及其气质

资 讯 | INFORMATION

◇全世界人类源自 36 个女人◇布朗称中国的发展模式必须改变◇在“改革争论”的背后◇垄断扼住了中国经济的咽喉◇1967 年的鸡血传奇◇中国与日本的经济差距悬殊◇第四次失业浪潮何时将临？◇食人兽与上帝的妖物

封二 达利和七裸女骷髅

封三 “2006 中国当代的社会学图像”作品选刊

陈家刚/图

对思想的一个社会学考察

——博弈论与社会

潘天群*

真理的表达之秀

没有赤裸裸的真理,只有真理的表达。

我们这里的所谓真理,是对那一类特殊的即我们以之为“真的”命题的称呼,它们是学者或思想家的言语表达活动的内容。

学者或思想家的表达方式无非两种:一是文字表达方式,二是口头表达方式。前者是大多数学者所采取的,后者则是少数特殊的人物所采取的,如中国古代述而不作的孔子、古希腊好辩的苏格拉底。

学者或思想家与政治家的目的是共同的:试图用某种行动影响周边尽可能多的人。当然,他们的行动方式存在差别。在这个意义上说,任何思想家都是政治家。

著名的物理学家玻尔说,物理学提醒了我们一个古老的真理:“在伟大的存在戏剧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玻尔所要表达的是,量子力学揭示了观察者与世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真理的表达者即思想家,何尝不是集观众与演员于一身?当他们“听”或“读”时,他们是观众;而当他们“说”或“写”,即表达时,他们便是演员。

真理永远是与说出者本身一起被阅读的。真理的意义或思想,乃至于是否是真理,体现在他人(同时代的、后代的他人)的阅读和理解之中,而这里的阅读和理解离不开对表达者语境的阅读和理解。这是常见的现象,不同的人表达“同样的”东西,但所产生的表达效果往往不一样。一个极端的例子是,在“大人物”(即政治家、思想家)那里,一句平常的语句被认为“思想深刻”,需要“深入学习”、“挖掘

* 作者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其意义”，而在普通老百姓那里，同样的一句话，可能被看成是“谬误”。由此可见，真理与表达者的“位置”密不可分。

如果真理与它的表达密切相关，那么就不存在真理的“正确”与“错误”之分，而只存在“成功的”表达和“失败的”表达之分。一个所谓“正确”的句子由于不恰当的表达可能成为“谬误”，而一个所谓“错误”的句子被恰当地表达能够成为“真理”。

这给苏格拉底的名言“权力即是真理”提供了另外一个诠释：表达需要权力，追求权力就等于追求真理！

学者的表达之博弈

既然思想在于表达，学者或思想家就是博弈的参与人。

这里，我们将学者与思想家做一个简单的区分：学者是进行学术探究的研究者，而思想家是新观念的提出者。

思想家与征服者具有共同的特征：征服者希望他所控制的人口尽可能的多，土地尽量大；思想家则希望他的思想占领更多人的脑袋，控制更多人的思维。所不同的是，征服者用武力控制他人，而思想家用观念或思想控制他人。正如征服者为了达到他征服的目的要使用策略一样，学者或思想家也在使用策略。

哲学家早就给出言语是一种行动的论证。后来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提出了“语言游戏论”，游戏没有本质，语言活动同样没有本质，而只是语言使用者或共同体中的活动。游戏者，博弈也。根据奥斯丁、塞尔等人的言语行为理论，人们的言语活动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充满意图的行动，学者或思想家的言语表达行为是有目的的策略性的行动。

无论何种言语活动都离不开他人，言语者在与他人的交互行动中实现自己的目的。既然任何人的语言行为都是博弈，以语言谋生的学者或思想家必定是言语博弈的高手了。

作为言语博弈的参与人，学者所要做的是选择特定的环境表达特定的语句。思想家首先要尽量使自己的观点新颖、与众不同，这样才能影响更多的人；其次，要防止他人的误读，尤其是有害的误读。

要提出从来没有被其他人提出过的新颖观点是很难的。人类文明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宏大的思想基本都被人们提出过。各种逻辑上可能的思想或观念也被人

们尝试性地提出过,这也是当今学者苦恼的原因。为了能够使观点新颖,吸引或征服更多的读者,学者们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地将他人的观念、思想拼装、组合。

思想的好与坏在于它的社会影响。学者总是希望自己的观点、思想产生广泛的并且是好的社会影响。有些社会影响可能是学者提出他的思想时未曾预料到的,如果这个影响发生的时候作者还在世,并且如果这个未曾想到的影响是坏的,他会竭力做出声明,否认这是他本来的意思,而是出自他人的误读;如果这个影响是好的,他会沾沾自喜,自认为自己先知先觉,有未卜先知的本领。

思想的影响往往超越时代。人的生命不过几十年,最长 100 多年,而思想的影响可以是几百年、上千年。为了能够产生好的影响,思想家往往要预先估计他人如何对自己的观点进行阐释。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有巨大的影响并产生他预想的影响,思想家力图做出相应的策略选择。

因此,思想家的表达行为是一个与读者之间的博弈。这里,他不仅要与当下的读者博弈,而且要与未来的读者博弈。

但是,学者或思想家是很难准确预测到自己的思想是如何被理解的。任何思想均有可能被各式各样的人肢解、误读,为他人所利用。有些出于无意,有些则是故意。无论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他们往往都将自己解读出来的意义说成是原作者的意思,而原作者早已作古,无从对质。这也可以说是学者或思想家的悲哀了。

思想之害

社会不能没有思想,但有些思想是有害的。

人人都爱惜生命或应当爱惜生命,然而“9·11”事件中恐怖分子终止了自己的生命,也终止了两千多无辜者的生命。“9·11”悲剧就是有害的思想造成的。要祛除思想之害,一个方法是使人们不要有思想。老子说“使民无知”,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

任何观念或思想,包括“正”的或“邪”的宗教,都想占有更多的人的脑袋。其中,有些被表达出来的观念或思想是有害的。

我们每个人似乎都以为能够以自己独特的心灵去感悟本体。我们往往受他人的观念或思想的浸染,而没有直接聆听本体。只要我们能祛除各种思想的污染而直接面对本体,我之思便是我的,此时我便是思想家。但我们能够吗?

我们必须借助于语言来思考,但语言包含着各种先在的观念或思想。思想或观念虽然是被人所创造出来的,但它一经问世,便不屈不挠地生存下来,并发展自身。而它的生存与发展是借助于我们的头脑进行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不是我们借助于这些先在的观念或思想来思考,而是这些观念或思想借助我们的头脑来思考。

我们可以看到,人的真理表达活动是观念或思想借助于人来发展自身的过程。我们的脑袋是观念或思想的实验场。若我们太固执,我们就中了历史上已经存在的思想或观念之圈套了,被这些观念或思想“骗”了。这个论点多少有点离经叛道。

英国著名生物学家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发明了一个新的词 meme(我们可以将之译成“模码”)。meme 指文化基因,它是一群体区别其他群体的基本单位,正如同基因作为基本单位使一个物种区别于其他物种一样。模码是人类群体的特质,它也在遗传和变异;而它的组成是观念或思想。

模码时刻在变化,以应对环境的变化,如同基因一样。观念或思想借助于我们的心灵向各个方向发展,它通过试错而前进。向错误方向的发展的观念或思想便成为有害的思想。

被病毒侵袭的是人的身体,被错误思想之毒侵袭的是人的心灵。

禅宗大师惠能宣扬不立文字、直指内心的顿悟传法,他知道以文字存在的观念之害。然而,他的思想——尽管是新思想,但仍然是思想,它本身又能够发展成一种侵害心灵的病毒!

人们说某人“执迷不悟”,是说某人被某个观念或思想所侵害而不能自拔。其实,我们每个人均不自觉地被各种观念所侵蚀。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被观念病毒侵害严重者的“临床表现”:有的人发生集体性自杀,因为他们相信他们可以进入天堂;学术界因所谓观点不同往往发生争执乃至谩骂、人身攻击;布鲁诺坚持“日心说”而被坚持“地心说”的教会烧死,无论是布鲁诺还是那些教父们均是观念的俘虏者……

写到这里,我清楚,上述这些文字并非是我本人的,而是各种先在的观念或思想借助我的脑袋而向前延伸而已,但愿它们不是有害的思想。

“搞笑诺贝尔”与虚实之辨

王开岭*

2004年9月30日，在美国哈佛学会堂，一场狂欢式的颁奖典礼正在举行：口哨迭起，纸箭乱飞，服装怪异的各色人等，语焉不清的乐队伴奏，时而全堂寂然，时而满席哄笑……

此即“伊格诺贝尔(Ig Nobel)”的颁奖现场，俗称“搞笑诺贝尔”。它由哈佛大学的《不可能研究年刊》主办，每年评出医学、文学等共10个奖项。《不可能研究年刊》创刊于1991年，是一份幽默科学杂志，人们戏称为“冒泡”，其封面上印有一行字：“记录华而不实的研究和人物”。如果说“搞笑诺贝尔”是一枚傻呵呵的蛋，而《冒泡》即那只整天笑咯咯的母鸡了。这只鸡宣称：该蛋旨在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专门赠与那些“不寻常、幽默”的“杰出科学成果”。

从氛围到规则，从气质到内容，从精神到道具，这一奖项都包含着对传统科学奖励模式的巨大挑战——

2004年度和平奖得主：“卡拉OK”的发明者——日本人井上大佑！获奖理由：“‘卡拉OK’这项伟大发明，向人们提供了互相容忍和宽谅的新工具！”2004年物理学奖得主：渥太华大学的巴拉苏布拉尼亚姆、康涅狄格大学的图尔维，两人揭示了呼拉圈的力学原理。工程学奖则授予了佛罗里达州的史密斯和他的父亲，他们通过精心计算得出结论：秃顶者把头发蓄到一定长度，将前面一部分向后梳齐，用摩丝定型，再将侧面头发顺势向顶部拢合，此效最佳。而生物学奖被四人摘得，他们共同证明：青鱼的交流方式是放屁……

看得出，对“雕虫小技”的哄抬，对“微不足道”的鼓吹，正是“伊诺”全力以赴要做的事。再比如生物学奖：1999年授予了新墨西哥州的保罗博士，他培育出一种“不辣的墨西哥辣椒”；2003年授予了荷兰学者莫尔莱克，他分析出野鸭子存在同性恋现象。和平奖：2002年授予了“人狗自动对译机”；2000年，荣膺该奖的是英国

* 作者为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指导、作家。

皇家海军,在一次演习中,长官命令水兵不装实弹,而是对着大海齐声呐喊:砰!

“冒泡”主编亚伯拉罕斯对“伊诺”有一句告白:“先让人发笑,后让人思考!”那么,思考什么呢?

在“伊诺”的榜单上,有诸多让我们大跌眼镜的东西。按中国人的心理惯性,有句话早按捺不住了:这干啥子用?有何价值呢?

中国文化有着非常重实的功用传统和崇尚物值的习性,“实”一直被奉为正统而高高地矗立。以实为本、以物为大、以形为求、以效为能、物用性——尤其明显的有用和速效的有用,从来就充当着我们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估的衡器。无论术、业、技、策,皆有一副实用和物质的面孔……“没用的东西!”作为一句训斥式的中国老话,既是一种物格评价,也是一种人格评价,既可非物,亦可骂人。

两个多世纪前,当水烧开、壶盖扑哧作响时,谁能想到那个对此心醉神迷的少年会成为历史上的“瓦特”呢?事实上,那个小小的壶盖被沸腾之水已鼓舞了几千年,也被忽略了几千年。作为一幅情景,显然它缥缈无骨,一个眼光很实际的人无论如何也不会对此感兴趣。西方有谚:“如果你盯着一样东西长久地看,意义就会诞生!”这是一句很虚的话,也是一句伟大的话,许多世间的秘密和真相就蕴藏于此。瓦特的幸运在于,他没漏掉这样一个秘密!是性格帮助了他,是对细节的重视程度,是打量事物的那种“陌生感”,是沉湎冥想的习性——帮助了他!牛顿也如此,爱因斯坦也如此……较之于众人,他们注视世界的眼光里都多了一股迷离的东西,多了一抹遥远的宁静和深阔的缤纷。

那股迷离,那抹宁静和缤纷,就叫“虚”吧。虚,往往折射出一种理想主义和未来主义的超前眼光;实,通常代表着一股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近物需求。“虚”未必能转为“实”,但“实”,往往起源于最初的“虚”。

1752年7月的一天,在北美的费城,一位名叫富兰克林的男子擎着风筝,在雷雨交加的旷野上奔跑,说是捕捉天上的闪电,并把它收进自己的瓶子……百姓觉得这是个傻瓜,学者认为这是个疯子,可就是这位不可理喻者,最终被封授为避雷针的创始人。我想,要是那会儿有“伊诺”,没准他也能评上。

有人要说了,富兰克林的念头虽当时看来有虚幻色彩,但最终实现的仍是一种物用价值啊?不错,避雷针是一种“实”,但这“实”却发轫于“虚”——一种不合常态的大胆妄想,没了那股虚的精神冲动,一切都谈不上。若把“虚”仅仅当做一种潜在或变相的“实”来期待,若把生产“实”的大小作为评价“虚”的砝码,那“虚”的险情仍未减弱,“虚”的生存环境并未改善。所以,“虚”应恢复它彻底的独立角色和自

足地位,并在这个位置上给予尊重与呵护。

人们往往犯如是毛病:在经验逻辑上搭建一个一元博弈、你死我活的价值擂台——将“非理性”视为“理性”之敌。其实,双方并非一元式矛盾,非实用不是反实用,非理性不是反理性。在我看来,“伊诺”更多地宣扬了一种非经验和非理性价值,而不是把经验与理性打入地狱。

对待想象力,对待遥想和幻想,对待非理性和非经验的自由与浪漫,东方的态度往往比西方更苛责、更刻薄。比如,我们的成语资源中竟有很大一个板块被用来描述和指摘生活中的那些非理性事件,如“荒诞不经”、“痴人说梦”、“缘木求鱼”、“华而不实”、“故弄玄虚”、“空中楼阁”、“不识时务”、“不可理喻”、“痴人说梦”、“异想天开”、“匪夷所思”、“玩物丧志”……遗憾的是,如此厚重的务实传统并未分娩出一种严肃的实证品格和缜密的科学理性,倒是在世俗文化上脱胎出一套急功近利的习气来。待人处事,识物辨机,无不讲究实用,取近利、求物值,贪图速效速成,追求立竿见影……于是,竭泽而渔、杀鸡取卵的短期行为也就在“务实”的旗帜下浩浩荡荡地行进了。远的不说,放眼当下——资源上的采掘、挥霍、消耗,建设上的规划、投资、改造,教育上的考试、量化、评比,生活中的文化、交际、时尚……哪个不“短视”得惊人?对“效益”追求得惊人?

西方当然也有其务实的传统,幸运的是,它同样有着浪漫和务虚的传统。西方对“无用之物”的欣赏可谓源远流长,从古希腊文明到欧洲文艺复兴到近代启蒙运动,从天文、戏剧、音乐、宗教到对社会制度的憧憬和民主设计,从唯美主义、浪漫主义到形而上和哲学思辨,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与欧文的“和谐公社”,从《荷马史诗》到安徒生童话和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都散发着一股儿童式的缥缈和虚幻,从不同角度描画着荷尔德林的那句话:“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

相比之下,中国的诸子经典和后学们就显得功利和世故多了,不外乎以“中庸”为能的生存策略和攻防心技,老成持重、筹谋积虑,处处讲究天衣无缝、圆熟得体,弥漫着一股诡异之气和衰暮之霾。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中国古文明为“早熟的儿童”,而誉希腊文化为“正常的儿童”。的确,作为欧洲文明始祖的希腊人,不仅长着一副儿童的额头,还有着明亮的神情和轻盈的举止,不仅健康而且快乐;而中国文化从周礼开始,就满脸皱纹和心壑重重了,除了“跪”和“叩”,行动上多了“杖”和“拐”,不仅蹒跚而且哭丧着脸。

如果说中国文化资源中有严重缺失项的话,我想它们应该是:神话、童话、形而上学、科学理性和“乌托邦”……(中国当然有被后世称为“神话”的东西,但那是

“把人神化”，而非希腊神话那样“把神人化”——如此神话才能与生命进行正常交流与对话) 这些缺失恰恰决定了我们“飞”不起来，决定了我们是生存文化而非生命文化，是心计文化而非思想文化，是惰性文化而非激情文化，是“脚文化”而非“头文化”，决定了我们只能围着实用生存的磨盘——原地打转！

还有一现象，即作为一种人文的浪漫传统和理想主义习惯，西方文化中“虚”的盛行并未妨碍“实”的繁荣，其文化形态始终是多元、开放、兼容的，在每个时代的生存格局中，总能恰到好处地为理想者、保守派和实干家预留出相应的空间、比例及密度，且彼此和谐、互相激荡。不难发现，在欧洲历史上，几乎每轮“虚”的文化涨潮之后，都会迎来一场新的社会理性和科学精神的腾跃。也就是说，理想主义的梦幻憧憬——总能很快在现实地面上投下它飞翔的影子，最终成为一种现实，成为他们变革社会、导演历史、成就事实的一种才华。比如，欧洲文艺复兴后的人文社会的兴起和中世纪的终结，英国古典自由主义思潮之后的“光荣革命”，法国启蒙运动之后的《人权宣言》和接踵而来的工业革命……在东方历史上，你很难找到如此人文璀璨和理想激荡的时代。人际化、功利化和实物化的生存格局带来的是沉闷、压抑和惰性，故而在“实”的专制重压之下，一卧就是两千年。

当然，“伊诺”信徒们反对的并非我们东方的传统，其首先警惕的是自己的本土现实——尤其是 20 世纪以来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和技术主义的膨胀。这群保有童心的中年人敏锐地意识到：当实用理性过于膨胀，它所淹没的东西会比创造的还要多。其实，“伊诺”之所以发生并赢得了喝彩，本身就说明反实用传统的那个传统一直顽强地存在着。或许有人会质疑说：难道东方传统中就找不出诗意的元素吗？春秋、魏晋、唐宋、晚明……不都飘逸着放浪士子的衣袂身影吗？不错，在汉语的天幕中，在染满青苔的书简碑石上，的确闪烁着“虚”和“狂”的墨迹，但仔细打量后便可发现：它们不仅稀疏零落，而且多带有借酒浇愁的发泄意味，像是一个人在梦游，有散淡、遁世和流亡之感，这与西方那种群体感和现世性很强的、出自价值信仰与栖息方式的“虚”——相距仍远。也就是说，我们的“虚”多是学问意象和修辞层面的“虚”。我们可以拿孔孟和苏格拉底及弟子，拿陶渊明、苏东坡、孔尚任、王国维与弥尔顿、罗素、雨果、左拉，拿董仲舒、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与托马斯·莫尔、培根、潘恩、马拉，拿朱熹、方孝孺、王阳明、顾炎武与孟德斯鸠、洛克、卢梭、伏尔泰们做比较，无论生命气质、人文视界、信仰方式、入世方向和精神体积，皆判然有别。而且，更大的缺失还在于：即使有零星的“虚”，我们也很难去鼓吹和表彰它，在现实社会中，我们绝无放大和推演它的可能！

哲学和文学的恩怨

陆 扬*

哲学和文学的恩恩怨怨是一个大得没有边际的话题。但是如果这个“宏大叙事”竟也容人扯上两句的话,那么我想我该是个合适的人选。别的不说,自从恢复高考、告别修地球的日子之后,学士、硕士、博士一路读上去,我都是在中文系里拿的学位。我那差不多是 20 年的工作经历,算起来侍奉文学和哲学的时光也几乎是一半对一半。一开始我架不住回归故乡的诱惑,辞别文学院到一家社科院的哲学所去上班,久而久之熏陶下来,有一阵我认为自己当仁不让就是一个哲学家。但是,后来事情却有了变化。

变化可从 1999 年 5 月德黑兰的萨德拉(Mulla Sadra)研讨会说起。东道主邀请了三百位国外代表,我是其中之一。萨德拉是 17 世纪伊斯兰哲学神秘主义光照派的重要代表,诸如柏拉图主义、逍遥学派、诺替斯派、苏非主义等等世俗的和宗教的思想传统,在他的理论体系中都有迹可寻。在伊朗人看来,这位他们引为自豪的伊斯兰哲学家的地位要超过伊本·西那。同他那个时代的大多数哲人相似,萨德拉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是个诗人。在这次盛会上,我认识了在多伦多大学教比较文化的库马·塞迪夫教授。塞迪夫是印度裔,见到我就爱说 Hindi Chini Bhai Bhai。这是半个世纪前那个国度的流行语,意思是印度和中国是兄弟。Bhai Bhai 可不是 Bye Bye,虽然它们在发音上毫无二致。但不幸的是,后来 Bhai Bhai 真就成了 Bye Bye。有一天塞迪夫给我看他准备留赠大会的一本印度古代诗歌的英译,卷首译者引了柯勒律支的四句诗以为题记。这四句诗译成中文大致是这样的意思:

假如天堂里遇见我的爱人,
假如她折下一朵花儿,
假如我从梦中醒来,
手里抓着枝花儿。

*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

我读了一遍,又读一遍,一下子就愣住了。

柯勒律支是我熟悉的诗人,他的三首名作《古舟子咏》、《忽必烈汗》和《克里斯塔贝尔》,我几乎一字不落地读过,可是我怎么就没有发现他写过这几句神秘得叫人真假难分的诗呢?而且,它们的下文又是什么呢?后来,我在巴黎买回来一本柯勒律支的诗文集,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也没有找到这几句诗的踪影。

下文其实不必追究,这就够了。我很快释然。然后到了一个节庆,院里要为此个节庆出一本诗集。因为我的文学出身,我义不容辞,理当有所贡献。只可惜我搜索枯肠,连夜里做梦都在嘀咕,可偏偏诗神就是不肯光顾。这时候,我想起了赫西俄德《神谱》里的两行诗,彼时诗人称他在赫利孔山上得见缪斯,但闻她们说道:

我们知道如何编出酷似真情的许多谎言,

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将如实的真话道来。

按照我的理解,酷似真情的许多谎言是典型的文学手法,如实的真话则理应是向哲学看齐。依了赫西俄德,现在我应当说一说真话,为装点这个节庆一尽我的绵薄之力。可恨我不可救药,喜欢偷懒,我突然想开个玩笑,而且绝不流于空想,结果就给前面柯勒律支的那几句诗加上个很有哲学气派的标题,面不改色交了上去。我满心期盼可以鱼目混珠,蒙混过关,可是鱼目如何能够混珠呢?那部诗集是柏拉图所说的颂神和歌功的好诗,我那可耻的瞒天过海之作,当然是给扫地出门了。

柏拉图《理想国》卷十已经说到,哲学和诗的争吵是由来已久。哲学家骂诗人是“对着主人狂吠的狗”,诗人讥讽哲学家是“缜密地思考自己贫穷的人”。柏拉图自己的立场自不待言。他的理想国要请哲学家来做统治者,诗人则因为蛊惑人心,远离理性,在愿意改邪归正之前,只配遭到流放的命运。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判定诗高于历史,因为历史写过去的和个别的事情,诗则可以通过可能性和必然性,来写过去、现在、将来,所以“诗比历史更具有哲学意味”。显而易见,即便是在久被认为是替诗人正了名的亚里士多德眼中,诗在哲学面前也还是个二等公民,因为它的哲学意味再深长,肯定也是超不过哲学自身的。

哲学,依照德里达的说法,它的陈述结构是由逻辑和理性构成的,而非完全依靠“表达”了它们的语言的修辞手段,这明明白白是以反对文字来界定自身。可是哪一种哲学可以脱离文字构架起它的空中楼阁?除非是“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苏格拉底。但即便是苏格拉底,若没有柏拉图和克塞诺芬尼不遗余力地追叙先师的犀利辩锋,他老人家的道德修行还不是早就化做了泡影?德里达致力于颠覆形形色色的二元对立,哲学和文学不过是其中之一。就像他对文字/言语、自然/文化等等配对

的概念淋漓尽致地加以解构一样，哲学和文学的主仆关系一时间似乎也颠倒了过来。但问题其实远非如此简单。哈贝马斯质疑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时说，德里达等人消解哲学和文学间的界限，本意是为颠覆理性为上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但由于此一消解完全抹杀了文类和学科之间的起码区别，实际上是趋向于围绕一个新的中心来重新构筑文字的大一统体系，这个中心就是文学。应当说哈贝马斯所见完全正确，只是恐怕他过高估计了德里达的文学热情。不错，德里达说过他从小就喜爱文学，但是他同样也说过自己从来不后悔选定了哲学这个职业。20世纪70年代，法国政府兴许是意识到了对孩子们高谈哲学是多么无聊，曾经推出在公立中学高年级中取消哲学课程的教改方针，德里达曾为此身体力行做过不懈抗争。所以，即便是设身处为他本人设想，我想他也绝不会甘心让哲学屈居于文学之后的。

德里达已经作古。作古以后好评如潮，大家都惋惜又走了一位大师。但是就因为他同文学的缘分之故，有一阵子连他的哲学家身份也让人疑惑起来了。1982年，德里达离开他解构主义的发祥地巴黎高师，转而供职于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说起来叫人不敢相信，是时名满天下，引得满世界的人都言必称解构的德里达居然还不是正教授。2000年，作者在法国曾问过时任巴黎高师哲学系主任的克劳德·厄姆贝尔教授：高师为何吝嗷一个教授教职，而一至于此？回答是当时哲学系没有新增教授的名额，所以德里达另谋高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说来也巧，德里达走了不久名额就下来了。呜呼！让我再砍头去尾引一封同年收到的电子邮件，发件人是法国巴黎第四大学哲学系的帕斯卡尔·昂格尔教授：

我必须同时承认，国外对法国哲学的理解是有些许甚至很多误解。这是说，一些作家，如德里达、福柯以及当今被归在“法国哲学”名下的许多“哲学家”，事实上在法国并没有多少人去研究。他们是20年以前的故事。今天，在国外被视为法国文学批评和法国“理论”的东西，只局限在一些小圈子里，大都处在正规的学院机构之外。换言之，眼下时兴的“法国哲学”标签，是美国院系创造出来的一种神话！

这封电子邮件的背景是，我有幸得到国家的一项资助，让我在新千年的第一年过去之前到法国去当一回访问学者。最初我收到的是德里达的邀请信，因为被一些事情缠住没能及时成行，一拖半年过后待到想走，德里达已经退休下来，远渡重洋到美国哪个学校教书去了。无奈我只能再找愿意收留我的地方。巴黎第四大学就是我重新联系的学校之一。但是，那里的哲学系给我碰了个钉子。昂格尔教授说，以我的学术兴趣到他们系里去好像不太合适，因为他们的传统是中世纪经院哲学和笛

卡尔以及分析哲学。他的意思是我理应让法文系来接待,在那里,有文学理论、解构主义、美学以及后现代主义,才是我适得其所的去处。法国的法文系看来相当于我们的中文系,虽然外文不甚精通,可是接受起先锋理论来绝对一马当先。要不是很快又收到巴黎高师哲学系的来信,我实在要怀疑我同巴黎的缘分了。

由是观之,解构主义又阴差阳错地同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联系了起来。至少它在本国的正统哲学看来,曾经满不是那么一回事。可见,即便哲学有心同文学结盟,它也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但是文学呢?据说 20 世纪文学的最大成就是批评理论的突飞猛进,反之,取悦大众读者的虚构性创作倒是不值一提。张口主义、闭口理论的文学批评早就自成一统,它根本就不把作品放在眼里。1997 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访问华中师大的时候,我曾经问及他对上述观点的看法,詹姆逊以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明确表示这是当代西方一些右翼批评家的观点,但紧接着他讲到,当代西方青年学生中,的确存在偏好理论胜过作品的倾向。他的学生不读文学作品,而读文学理论;不读普鲁斯特,而读德里达。这样来看,如果说文学自身在日趋分化,它的一部分投靠了专心侍奉感官的大众文化,一部分则见异思迁,非要去与高深的哲学形而上看齐,该不是夸大其辞。

因此,我觉得有必要澄清哲学和文学的性别。从历史上看,无论是把哲学比做至高的女神,如五世纪的波爱修;还是把它比做主管一应婢妾仆妇的主妇,如一世纪的犹太哲学家斐洛;抑或把它比做高踞在一切婢女之上的婢女,如三世纪的奥里金,都是将哲学当成了女性,可是,哲学其实是一位男性。他居高临下,一语破的,百折不挠,明察秋毫,一副将世界把玩在掌中的大家贵族气派。即便需要文过饰非,他也理直气壮,冠冕堂皇,绝不会露出羞羞答答的可怜相来。反之,文学理所当然是一位女性,她颠三倒四,优柔寡断,扑朔迷离,经常是南辕北辙,无的放矢,惯于向壁虚造而不善示人以赤裸裸的真理。因为文学与生俱来的游戏天性,我们总听到她在唠唠叨叨作自我辩白,忽而声明她是在如实反映人生,满载着人文关怀;忽而提醒人她原本什么都不肯定,所以从来不曾撒谎。说这些话的时候文学自有一种微妙的魅力,打扮修饰下来,女人味十足,只因她时时提心吊胆,唯恐她的男性上司看不入眼。哲学就从来无须费这份心思,他就是真理和思想,表征世界和人生,舍我其谁?这并不意味他对异性不感兴趣,相反,他一生都觉得他的女性下属神秘莫测,无从捉摸。文学的眼风一飞过来,哲学便神经兮兮地紧张起来,心猿意马,魂不守舍,却不敢对男尊女卑、主仆有别的道理稍有忽略。这决定了他对异性的经验总是浅尝辄止,盖非迷途知返,立地成佛,不成其为哲学也。

戏 说

“套 诗”

戈 革*

随着旧文化和旧文学的日趋绝灭,人们欣赏旧诗文的兴趣和能力也越来越衰退了。在某种意义上,这真是咱们中国人的一种悲哀。将来的中国人中,肯定还会是越来越少的人能够“懂”诗,但他们那种“懂”法,肯定会和我这一辈子的“懂”法大不相同!

“打油诗”是一种游戏文字,本来是不登大雅之堂的,但是此体却也源远流长,而且有不同的体裁。如果“相声大师”可以到大学中去当兼职教授,“打油诗”也应该在大学中文系中开一门课吧!但是我敢说,诸如“卡斯奥编辑”之类的“系主任”是完全彻底地听不懂此种课程的,猗欤盛哉!

现在只谈“打油诗”中之一体,即所谓“套诗”。本来有一首诗,流传甚广,童叟皆闻,讲的是一种完全正经的事情,现在有一个聪明的刻薄鬼出来,把那首诗改几个字,便成了咏另一题目的另一首诗,使人读了忍不住要笑。这就叫“套诗”。

好的“套诗”并不是那么容易作,须得时机凑巧,妙手偶得之。现举数例,以供看官们一笑。

抛锚诗

汽车出了毛病,中途走不动了,谓之“抛锚”。抗战期间,各种汽车的“抛锚”事件是使老百姓十分头痛的灾难之一,因此有人作诗消之。

且说旧时小孩入学必须学写毛笔字。先写“大字”。由老师写一“仿影”,即标准字样,学生则用薄纸罩于“影”上,照“影”描之,谓之“写仿”。因为刚学写字,仿影不能太复杂,应尽量用笔画少的字,旧时常用的仿影有一诗曰:

一去二三里,沿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此诗含一至十的十个数字,且全诗无一复杂的字,也略有意义,故使用频率很

*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教授。